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二辑



WENSHI ZILIAO
XUANJI
中国文史出版社

ZHONG GUO WENSHI CHUBANSHE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二辑

(总第 132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史资料选辑 第 32 辑 总第 132 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
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2

ISBN 7-5034-0808-1

I. 文… II. 全… III. 文史资料-中国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5092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

装 订: 富利装订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68 1/32

印 张: 7 **字数:** 178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版 次: 1997 年 2 月北京第一版

印 次: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本 辑 导 读

○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自青年时代起即对哲学深感兴趣，几十年来，潜心治学，笔耕不辍。让我们静下心来读一读作者的《**耄年回忆**》，不仅能够了解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和治学道路，或许从中可以得到不少的启迪。

○1971 年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揭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关闭了 20 年的中美两国人民友好来往的大门是怎样打开的？《**一次神秘的外交使命**》、《**一次震撼世界的外交壮举**》两文披露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而又鲜为人知的史实。

○1960 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第一次飞起我国自己制造的导弹。1970 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太空中响起了“东方红”的乐曲……当我们庆祝航天事业 40 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时，你是否想知道它是怎样起步和发展的？《**第一种国产导弹的诞生**》等文章向读者讲述了航天工作者攀登科学高峰的艰苦历程。

○现任民革中央名誉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的贾亦斌曾是蒋经国的直接部下和好友，官至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副局长、代局长，是当时所谓“太子军”的青年军的领导人。《**我与蒋经国从友好到决裂**》详细叙述了作者“觉今是而昨非”的心路历程。

文史资料选辑

第 32 辑 (总第 132 辑)

名人自述

老年回忆 张岱年(1)

外交史话

50 年代前期中捷友好关系

的若干回忆 李清泉(39)

瑞士七年 李清泉(62)

一次神秘的外交使命

——接待基辛格秘密

访华 唐龙彬(77)

一次震撼世界的外交壮举

——接待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首次访华 唐龙彬(8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

目 录

航天春秋

- 第一种国产导弹的诞生 林 爽(98)
远程火箭研制片断 梁思礼(107)
为了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 张贵田(114)

往事追怀

- 我与蒋经国从友好到决裂 ... 贾亦斌(122)
珍藏文物历难记 吴 徠(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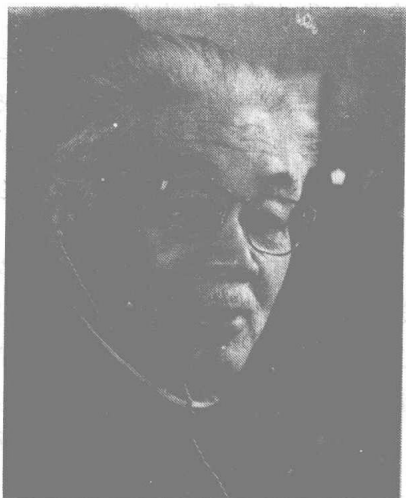
人物述林

- 忆人民教育家俞庆棠 秦柳方(186)
中国近代化学制药业的开
拓者赵汝调 ... 钱椿涛 钱听涛(194)
记祖父李根源抗战初期
新疆之行 李成缙(211)

编辑人员 王合忠 张燕妮 封玉敏
责任编辑 张燕妮

耄年回忆

○ 张岱年



张岱年，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1935—1936年著成《中国哲学大纲》，为中国近代第一本系统论述中国哲学范畴的专著。曾任私立中国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主要著作还有《中国哲学发微》、《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文化与哲学》等。

我的家庭和幼年时期

我生于1909年5月23日（夏历四月初五日），当时父母住在北京。据一个同族的长辈对我说，当时你们家住在北京西城酒醋局。到三岁时，母亲带着子女回乡居住，我幼年是在乡间度过的。原籍河北省献县，我家所在的村庄名叫小垛庄，是一个很小的村

庄。到 50 年代，这个村庄划归沧县，我的籍贯改为沧县了。

我父亲名濂，字中卿，一字众清，生于 1872 年（清同治十一年）。母亲赵太夫人，生于 1869 年（同治八年）。我们家历代在农村生活，到我祖父时渐至饶裕，成为中小地主。祖父有子七人，我父行六。祖父读书而未应科举，四伯父张润应举中拔萃科，是为张氏应举的开始。众清公于 1905 年（光绪二十九年）考中进士，改庶吉士，入进士馆肄习法政，1907 年授职翰林院编修。辛亥革命以后，1918 年（民国 7 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之后曾任沙河县知事及枣强县知事。晚年在北京闲居，任燕冀中学的校董。晚年喜“黄老之学”，以为黄帝老子高于儒家，研究《黄帝内经》与《黄庭经》。喜书法，崇尚颜体，所写的字刚劲凝重，尝印一印章云“留心翰墨近四十年”。又认为在五伦之外尚有一伦，即没有朋友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称之为“人”伦。因而自号六伦。晚年在京经常来往的朋友有尚节之（秉和）先生、陈紫纶（云诒）先生、刘润琴（春霖）先生等。

母亲是河北省交河县赵家庄人，勤俭持家，待人慈和宽厚。民国初年即回乡居住，主持家务。母亲生四子二女，劬劳实甚。我的长兄名崧年，字申甫，一字申府；大姊张敬，二姊张敏，二兄崇年，我行三，还有一个四弟。约在 1918 年（民国 7 年）秋天，东邻二伯父家的场院中柴堆失火，我家场院距离很近，母亲指挥长工赶快搬移我家的柴堆，幸而没有烧着。但是母亲由于高度紧张，惊慌太甚，第二天遂患半身不遂。我的四弟很伶俐，胆大活泼，一天独自到村边一个池塘洗澡，竟至溺死，没有抢救过来。当时吾母卧病在床，遭此惨痛，遂于次年（1920 年）4 月 5 日逝世，寿仅 52 岁。吾母病时，全赖二姊服侍，请过几次中医，都不见效。当时我年幼无知，未能帮助服侍，思之甚愧！

我三岁时随母回乡，过田园生活，五六岁时进村中族人办的学塾，背诵《三字经》、《百家姓》。之后，父亲为二兄和我延请一个表兄卢先生教我们念《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

只是背诵，并不讲解，也教我们看新式小学课本。当时念的书不多。有一次到村中学塾中听一位杜先生讲《左传》“郑伯克段于鄢”，听来很感兴趣，也能大致听懂，但没有继续读《左传》。

母亲病逝时，父亲和大兄申府都不在乡中，他们都在北京，闻讯归来，办理丧事。1920年（民国9年）夏初，办完母亲丧事，父亲带领全家离开家乡，到北京居住。当时父亲任众议院议员，住在西城辟才胡同南半壁街16号。父亲在北京住了几十年，始终未买房子，仅租房居住。这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属于中下等类，每月租钱银元30元。到这年秋天，由大兄申府安排，叫二兄和我到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插班学习。二兄上高小三年级，我上高小一年级。初入学时赶不上，家里又为我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很快就赶上了。三年之后，小学毕业，毕业考试名列第四。当时北师大附小的主任是张铎民（安国）先生，毕业后还有联系，但几年以后他就去世了。（北师大附小在解放后改称宏庙小学。）

当时长兄申府已经毕业于北京大学，留校工作，正在北京参加新文化运动和革命活动，在学术界因介绍罗素哲学而知名。他白天都不在家，早出晚归。他在外面的活动也从不告诉家里人，我们只知他很忙。不久他就赴法国参加勤工俭学活动去了，几年后才回国。

我和二兄崇年经常在一起。母亲在世时，常对二兄和我说：“你们要努力向上，做个好人。”我们遵循母亲的遗教，努力读书学习，从不沾染社会上的各种恶习，对于世俗的娱乐如听戏打牌等亦无所好。父亲不过问我们的学业，偶尔加以勉励。在所住四合院中，我住南屋，父亲为南屋写一幅对联云：“醴泉无源，芝草无根，人贵自立；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民生在勤。”这寓有勉励之意。父亲在住宅大门贴一副对联云：“大林容豹隐，原野听龙吟”，表现了自己过隐居生活的态度。

在京求学

1923年（民国12年）暑期，我小学毕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试验班，入学即上中学一年级第二学期的课程。1926年初中毕业；1927年春考入高中班。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附中主任（实即校长）林励儒先生为全校做了一次学术讲演，讲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三大律令”，林先生强调这是康德的大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听了非常感动，非常钦佩，从此“要把每个人都看作目的，不要看作工具”这一道德律令深深印在我的头脑之中。

当时国难深重，每年5月7日定为国耻节，举行纪念活动。当时我也看了一些关于社会问题的书籍，知道中国人民的任务，一是外抗强权，争取民族独立；二是改造社会，革新政制。初中毕业时，班主任卢玉温（光润）先生让每个学生写终生志愿，我写道：“强中国，改造社会；成或败，退隐山林。”今日看来很可笑，表现了当时狂放和幼稚。中年以后，自知不是搞政治的材料，就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了，但是报国之志是始终不渝的。

初中二年级之时，同学庄镇基喜谈老庄哲学，于是引起我对于哲学的兴趣。我初读《老子》，如入五里雾中，感到莫明其妙。后来读了一本《新解老》，其中认为老子所谓道即是天地万物的最高原理，于是忽有所悟，对于老子学说有所理解。又读了《哲学概论》一类的书，对于哲学有所领会。

当时对于哲学有所了解之后，于是对于宇宙人生的一些重大问题深感兴趣。常常独自沉思：思天地万物之本原，思人生理想之归趋。每天晚上经常沉思一两小时，养成致思的习惯。

高中一年级时，班主任汪伯烈（震）先生开了“中国哲学史”课程，我很感兴趣。汪师兼通文学、哲学、心理学，对于美国詹姆士哲学有较多的研究，常和我们谈论当时学术界的情况。汪师在一份题为《认识周报》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论述当时中国哲

学界的文章，评述了胡适、梁漱溟、朱谦之、张崧年等的思想，说张崧年是中国新实在论的代表。这时我才稍知长兄申府与当时中国哲学界的关系。当时我在“作文”课中写了一篇题为《评韩》的文章，内容批评韩非反对道德教化专重刑赏的观点。汪师甚为欣赏，在课堂上对全班同学说：张岱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大学三年级学生的论文也不过如此。对于汪师的赞赏，我衷心感激。汪师将这篇文章刊登在当时《师大附中》月刊上，现在已遗失不存了。

在中学读书时，国文教师和学生接触较多，因而印象较深。国文老师，汪伯烈先生之外，还有张少元（鸿来）、张建侯、董鲁安、卢伯玮、夏宇众诸先生。其中汪伯烈先生、卢伯玮先生对于我都很器重。也有一位数学老师丁文渊先生，师生情谊较深。我读初中时数学课成绩较好，丁师再三劝我研究数学，可惜我的兴趣后来转向哲学史方面了。

在高中读书时，我写了一篇考证列子的文章，题为《关于列子》，内容是证明列子实有其人，反驳列御寇系子虚乌有之说。投寄《北京晨报》，于1928年3月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这是我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得稿费银元8元，当时甚为欣喜。

1928年暑假，我报考清华大学，被录取了。开学之后，添设了军事训练，由两个国民党军官任教官。我不愿受国民党的军事训练，退学了。适逢北京师范大学招生，遂又报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也录取了。当时本拟报考北京大学，那年北大招生较晚，因已被师大录取，就到师大入学了。原师大附中的同班同学阮庆荪、庄镇基、陈伯欧、陶雄、谷万川等也都考入师大，老同学又聚在一起了。由谷万川介绍，认识了王重民；由王重民介绍认识了孙楷第、刘汝霖。当时王重民、孙楷第等组织了一个努力学社，出版了一期《努力学报》，邀我写一篇文章，我写了一篇，题为《古书疑义举例再补》，是一篇考证文章。

当时阮庆荪、陈伯欧、谷万川等又组织了一个“人间社”，是

一个研究文学的学社，在此社中认识了潘炳皋。人间社有时请学者来校讲演，有一次请大兄申府来讲了一次，题为“辩证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颇受同学们欢迎。申府后来在师大开“现代哲学”课程，讲新实在论哲学，历史系的张恒寿也来听讲，于是彼此结识，成为莫逆之交。

教育系的同班同学傅继良建议合译一本书，于是选译了杜威的一本小册《教育科学的源泉》，由同学高元白协助出版。傅继良还想再合译别的书，但我的兴趣转向中国哲学史，不想译书了。

当时北京师范大学采用学分制，不计年龄，学分够了可以毕业。许多学生由于生计困难往往中途到一些中小学任教代课，然后再回到师大受学，学分够了才毕业。我在师大读书时，深喜自学，读西方哲学名著，不爱听课，因而过了四年而学分不足，又补了一年学分，于1933年毕业。我写的毕业论文是《怀悌黑的教育哲学》，导师是邱椿先生。由傅继良协助，此文在《师大学报》上发表了。

30年代至40年代的探索

1931年至1933年，我虽在师大听课，而大部分时间用于自学，一方面研读中国古典哲学著作，一方面研究西方哲学。也阅读了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书，如梁任公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很感兴趣，但不满足。1931春，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上卷出版，考辨之精，论证之细，使我深深敬佩！我本来对于老子年代问题有兴趣，在冯著上卷的影响之下，写了一篇《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投寄《大公报·文学副刊》，承编者嘉许，发表出来。此文认为《老子》书当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颇得罗根泽先生同意，后被编入《古史辨》第四册中。

关于西方哲学，在吾兄申府的引导之下，读了一些英文哲学

著作。最喜读罗素 (B. Russell)、穆尔 (C. E. Moore-译摩尔)、怀特海 (A. N. Whitehead)、博若德 (C. D. Broad) 的书。对于此派学者的逻辑分析方法甚为赞赏。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译籍受到青年人的欢迎。我读了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的中译本,虽然译笔不甚明畅,但能窥见大意。(40 年代才读到这些著作的英译本。)我衷心接受了辩证唯物论(包括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我以辩证唯物论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新实在论、实用主义、生命哲学、突创进化论、新黑格尔主义以及尼采超人哲学作了比较,认为辩证唯物论既博大精深又切合实际,实为最有价值的哲学。我认为,辩证唯物论在认识论上解决了西方近代哲学中唯理论与经验论的矛盾,既承认感觉经验是认识的基础,又肯定理性的重要作用,理性认识以感觉经验为基础而又高于感觉经验;关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既肯定物质是本原的,又承认精神对于物质的反作用。因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哲学。

1932 年,吾兄申府主编《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使我有机会发表一些长短不同的学术文章,颇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是为我参加学术论坛之始。当时写文,多署名张季同(因为我敬佩“大同”理想,故署名季同)。

由吾兄申府介绍,认识了哲学界前辈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冯友兰先生。熊先生看到我在《大公报·世界思潮》上的文章,对吾兄说:我想和您弟弟谈谈。于是我访问了熊先生,熊先生赠我他的著作《新唯识论》与《破破新唯识论》,我向他请教有关中国哲学的问题。我不赞同他的“唯心唯识”观点,但钦佩他的独创精神。我访问金先生,金先生说:“你写的《问题》一篇分析得很好,分析这条路子是哲学的一条可行的路子。”我访问冯先生,谈有关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彼此见解相近。

1933 年夏,在师范大学毕业了。因为当时已经发表学术论文

多篇，于是清华大学聘为哲学系助教。这是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推荐，梅贻琦校长批准的。秋季开学，让我讲授“哲学概论”。吾兄申府决定，让我用美国 D. S. Robinson 的“An Introduction to Liring Philosophy”作为课本。我讲课时，增加了西方古代及近代哲学的材料，并且较详地讲述了辩证唯物论哲学，并称之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

在清华大学任教，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是与张荫麟先生定交。荫麟字素痴，对于哲学、史学、文学都有高深的造诣，他赴美到斯丹福大学留学，1933 年回国，到清华大学任专任讲师（即副教授）。他虚怀若谷，看到我在《大公报·世界思潮》上发表的文章，表示赞同，遂成挚友。他时相过访，议论相近。后来到抗战时期，荫麟先生不幸在南方逝世，年寿不永，实为学术界一大损失。

我到清华任助教之次年，不幸遭遇大故，父亲患病不愈，于 1934 年（民国 23 年）3 月 4 日（夏历正月十九日）逝世，家里一阵慌乱。父亲逝世后，大家庭解散，大兄、二兄和我分居了。

我 30 年代所写文章，可分为四类，一是关于中西哲学史的论述；二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三是关于哲学理论问题的分析；四是对于文化问题的见解。今略述其要点。

关于中西哲学史，我写过《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纪念斯辟诺莎诞生三百年》、《颜李之学》、《中国元学之基本倾向》、《中国思想源流》、《中国知论大要》等。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关于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法的两篇。以前讲中国哲学的很少谈到辩证法，有的也只是谈到老子，对于中国哲学中老子以外的丰富的辩证思维，很少涉及。我着重论述了老子、《易传》、杨雄、张载、王夫之的辩证观点，但讲得也不完备，没有讲孔子及朱熹的辩证思想。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写了《关于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其中《关于新唯物论》

一文依据自己的心得对于辩证唯物论哲学作了简要的评述，也有不尽恰当之处。《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展示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科学体系，意在表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仅具有深湛的观点，而且具有一个缜密完整的系统。《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是对于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阐述。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虽然没有关于伦理道德的专门著作，但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含有非常深刻的关于伦理道德的理论观点，因而试图加以阐释。但当时尚未读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故此文所讲是很不完备的。

30年代所写，比较重要的，是几篇提出个人哲学观点的文章。

1933年，我写了《论外界的实在》，意在从理论上证明外在世界的客观存在，反驳主观唯心论。我认为，外界实在是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决非无意义的，固然可以由实践加以证明，但是，如其是真理，必然也可以从理论上加以证明。此文在《大公报·世界思潮》发表时，吾兄加了“编者特记”云：“季同此篇，析事论理，精辟绝伦。切望平津读者不可因敌迫城下，心神不宁，遂尔忽之。同时更宜信：有作出这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对于吾兄的勉励，我非常感激！

1931年冯友兰先生在《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上发表了几篇《新对话》，主张共相实在之说，提出“未有飞机之前先有飞机之理”的著名观点。张荫麟先生著文进行争辩，认为共相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于是引起了我对于共相问题的兴趣。我联系中国古代哲学，写了《谭理》一文。文章一方面反对唯心论者认为事物规律只是人心所赋予的主观论，一方面也反对唯理论者认为在事物的具体世界之外还有理的共相世界的共相潜在论，也不同意实证论者的唯名论，而肯定共相的客观性。这是我30年代以来的一贯见解。

30年代以来，我一直关心中国哲学的前途问题，考虑中国哲学复兴的道路。1934年所写的《中国思想源流》的结语说：“西洋

思想之输入，当是对于中国的思想力复活之刺激。中国的创造思想无疑地要复活……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取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哲学若还不能独立，别的独立更谈不到。中国要再度发挥其宏大、刚毅的创造力量。”这是我的向往。

1935年我在《国闻周报》上发表《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提出了我对于未来中国哲学的见解。我认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最少须满足如下的四个条件：（1）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方哲学之优长以为一大系统。（2）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3）能创发一个新的一贯大原则，并能建立新方法。（4）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应合。认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必须是综合的。保守旧哲学的传统或根本唾弃旧哲学而企图作西方哲学系统下的一分子，都是不能适应现代中国之特殊需要的。对于中国过去哲学须能抉取其精粹而发展之、光大之，辨识其病痛而革正之、克服之，同时对于西方哲学亦要批判之、吸收之。我们所要创造的新哲学，固须综合东西所有哲学之长，然而综合应有别于混合或调和。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20世纪初年，英国哲学家 C. D. Broad 分哲学为两种，一为玄想哲学 (Speculative philosophy)，二为批评哲学 (Critical philosophy)。所谓批评的即分析的之义。Broad 与 Russell 都强调逻辑分析方法，其所谓逻辑指形式逻辑。30年代，中国学术界曾出现所谓辩证法论战，主张形式逻辑的反对辩证法，认为辩证法是诡辩；而主张辩证法的反对形式逻辑，认为形式逻辑是所谓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没有价值的。吾兄申府认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都是必要的，二者并无矛盾，而相辅相成，认为应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我同意申府此说。

30年代，有不少学者试图提出自己的哲学观点，如熊十力先生讲“新唯识论”，冯友兰先生写《新对话》，金岳霖先生讲“道、式、能”。这也引起了我的理论兴趣，于是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了《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试图提出自己关于哲学理论问题的观点。我认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文章赞扬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而主张“以唯物为基础而吸取解析方法以及关于人生理想的深湛思想”。

所谓“将唯物、理想与解析综合于一”，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综合，一方面在方法论上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起来；另一方面将现代唯物论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我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有一个唯物论传统和辩证思维的传统，更有关于人生理想的优秀传统，应该认真加以考察。

1936年，友人孙道昇发表了《现代中国哲学界的解剖》一文，评述了胡适、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等的学术思想，以张申府、张季同为解析的唯物论的代表。当时我发表文章，多以季同署名。孙道昇是清华哲学系毕业生，是冯友兰先生的学生。

1936年我将历年致思的札记编成《潜思录》，亦题为《人与世界》，其中对于一些哲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主要观点是：存在即是历程，宇宙是生生不已的变化大流，宇宙一本而多级，物质是一本，物质、生命、心知共为三级。人生之道是克服生命与生命的矛盾冲突以达到生命与生命的和谐。

1936年，冯友兰先生、汤用彤先生、金岳霖先生等在北京发起组织“中国哲学会”，召开了中国哲学会的第一次讨论会。冯友兰先生鼓励我提交一篇论文，于是我写了《生活理想的四原则》一文。提出关于人生理想的四个基本观点：（1）理生合一，（2）与群为一，（3）义命合一，（4）动的天人合一。

文章以“理与生”概括“义利”问题与“理欲”问题，对于宋儒所讲“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作了一定的矫正。文章在内容上提出了一些较新的观点，但写得很不通俗，而且采用了一